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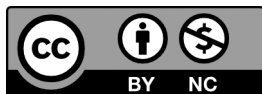
西安的幽默家们

[俄] 阿·谢·托罗普采夫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有生以来我还从未遇到过这样浓重而又混沌不清的烟雾。沿着那条公路奔驰，前后左右，眼睛无法穿透厚厚的雾幔。我们小心翼翼地向着那历史长河的上游追溯。在中国西北的交通要塞——古城西安，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她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宝库。碑林，名副其实的碑石如林。苍苔历历的石头上精美地雕刻着圣人的箴言；那儿还有冷漠孤高、气势拔绝的秦始皇陵；有中世纪的绝代佳人杨贵妃华丽别致的温泉赐浴池；她的墓穴至今还散发着千年以来的芳菲。当人们从这座激起灵魂巨大震颤的墓穴抓一把土返回到现实中时，这是一件多么神圣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难怪那些专家权威不得不用一层砌砖隔开了现实与幽冥……这片野性的黄土地用一座座土丘的标点符号缀起了高高的帝王陵墓，把长达 6000 年的历史紧紧地衔接了起来。

能够把遥远的历史回溯 3000 年之久，西安

人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当我问陕西人有无偏远闭塞之感时，省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美学工作者、俄语学者、文艺翻译家李四海（也是我的地陪导游），他语气坚决地给予否定性回答。然而，从北京到西安，火车要走 20 多个小时呢。从他们间接介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有些省区尽管距离北京遥远，但在同一制度下都各具特色。人们更热爱、珍惜那根源于古老文明、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风习。

现在，各个地区都处在发展和巩固经济自主权的轨道上，根本没有必要用一种限定的视角去看待事物的发展，正是由于减少过多的控制，各地区的发展步伐才能越来越稳定。

省艺术研究所正是处在这种氛围之中，但他们大胆冲破了地域性和社会上的地方观念的束缚。

汽车驶进了省杂技团的大门，绕来绕去，终于停在排练厅的旁边。未来全省的艺术研究中心、

现在的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七年前曾是一个地方性剧目工作室。他们在这里租借了杂技团的一、三层楼房栖身，没有暖气设备（而冬天这里也常落雪），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这里当然远不及首都的条件，一间间暗小的房间里都安装着暗锈色的小火炉，里面燃烧着早已备好的蜂窝煤，长长的细烟囱伸到窗外，一口口地吐着青烟。这种在室内临时安装的以期过冬的小炉子并不常使人感到暖和，倒是茶水（或者是热水瓶中的开水——热水瓶在中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使人心暖融融的，这些都促使人们坐下来交流意见，有时还进行十分热烈的辩论。

这些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视听设备。然而，这正体现了他们的现代化科研管理意识，说明了研究所五个科研部室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这五个科研部室分别研究戏剧、电影、绘画、音乐、舞蹈和艺术美学问题。

所长办公室很小，尽管研究所仅五十名科研人员，但这个办公室的狭小空间根本无法容纳任何会议的代表成员。所长陈孝英本人就是一团火焰，浑身充满了燃烧不尽的能量和激情，他集研究才能和组织才能于一身。他以旺盛的精力去研究探索，并渴求行政管理上的改革。他是一个中等身材、四十多岁的精干男子，也是一个坚定的开拓者，心中装满了崭新的观念和计划，并能付诸行动实践。他的体内就像是安装着一架“永动机”，不让他有片刻的间歇，不让他停滞不前。

他托付我说：“请帮我弄到尤·博列夫的《喜剧》一书，不是《论喜剧》，《论喜剧》我们已经译出，即将出版。”（尤·博列夫是他敬重的作家之一。除此之外，他们已经把苏联的其他喜剧论著也列入了研究计划，如《左琴科的幽默》、彼德罗夫的《艺术的奥秘》、弗里德连德、艾利斯别尔格等人的论著）。

陈孝英于工作之外的少许时间里，还喜欢唱歌、绘画，而且都干得不赖。几个表情严肃的人围坐在丰盛的宴会桌旁（这是中国人在一起进行严肃谈话的常见方式），不断被他那充满幽默而又神情严肃的话语所感染，被他那热情洋溢的祝酒词逗得笑出声来——这体现了他的“表演艺术”的水平。而他自己却常在公开场合说他的性格缺少幽默感，我认为不然，这也许是他天生喜欢运用的一种花招。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次连续性的“长跑”，没有一节休止符。然而，他总是面带阳光般的笑容对待一切，他环顾生活，祈望它能充满幽默。

除了幽默本身以外，陈孝英对每件事情的态度都十分乐观，这是因为，幽默是这位科研工作者（既是学者，又是行政官员）所酷爱的最主要的对象。难怪他的一位同事在报刊上撰文说：“此人已经加入了喜剧美学领域‘淘金者’的行列。”

通过他的名片我们知道：他既是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又是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和《喜剧世界》杂志的主编。

这份杂志与他的美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他呕心沥血的结晶。编者的刊首语中写道：“它为您奉献的，将是喜的世界、笑的世界、美的世界和智的世界。”这份杂志诞生于1988年，也是中国的龙年。它将会成为既有民族读者又有世界读者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杂志。

杂志主编在编者寄语中指出：“中国的‘喜剧’曾经历过悲剧的命运……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便习惯于把喜剧当成‘下里巴人’，把美学视为‘阳春白雪’。而我多么愿意看到《喜剧世界》能使‘喜剧’与‘美学’联姻，让‘喜剧’登上大雅之堂，把‘美学’送往穷乡僻壤。”从表面看，刊物的范围现在还局限于陕西省内，但聘请的一批顾问都是全国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特约编

辑名单中不仅有大陆学者，而且有中国香港、比利时、加拿大、苏联的学者。著名作家、文化部部长王蒙（也是陈孝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为创刊号撰写了《漫说喜剧》。

《中国幽默简史》《喜剧的美学特征》《喜剧艺术在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喜剧艺术》《肖洛霍夫的幽默风格》……这仅仅是我在西安的一个晚上，陈孝英亲手交给我的他在30年创作生涯中所发表的近200篇论文目录中的几篇。他早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写小说和短论，几年后又从事俄文翻译（他嘴边经常提及的作家是果戈理和谢德林）及文艺学研究，曾多次获得省市级和国家级奖励，其中，《论王蒙小说的幽默风格》一文曾获国家奖。

这篇颇有特色的评论五年前在中央级报刊发表时，我便结识了陈孝英，虽然那时我们还未谋面，但这篇文章已使我想就其论点同他讨论一番。譬如，说作家王蒙的风格具有幽默色彩的主要原因是他生性喜爱幽默，在我看来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又如，王蒙那篇充满矛盾冲突的小说《风筝飘带》（1986年第9期《外国文学》杂志俄文版），未必称得上幽默作品（虽然也有引人发笑之处）。但从整体上看，陈孝英发表的这篇文章仍然是十分出色的。它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文章准确地归结出王蒙的幽默是对过去极“左”思潮使人民所受苦难的一种补偿，那是他采用的一种微笑（有冷嘲热讽的笑、苦笑及其他意味的笑），与中国其他作家所采用的哭诉形式不同。不仅如此，论文的作者还打破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提出了系统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喜剧问题。后来他抓住这个问题，步步为营，扎扎实实地走下去，尽管永不满足的天性使他关注的精神世界十分宽广。

他的喜剧研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他把个别性的问题纳入普遍性的理论中去。

陈孝英借助外国的论著运用于中国的研究，从而把中国的理论提高到世界水平。第二，他使中国的幽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聚焦点。一位评论家在一份大型文艺杂志《当代文艺探索》上撰文强调指出，陈孝英的研究“驳倒了认为中国没有幽默大师的观点”。通过仔细比较，他发现古代中国的《诗经》中讽刺成分就占有相当的比重，而《诗经》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产生于同一时期，中国戏曲中喜剧性余兴节目的兴起比希腊要早3个世纪。戏曲的道白中充满了“包袱”（这是中国的一个专门术语的直译，表示在传统喜剧艺术中引入发笑的成分），陈孝英认为，它在很多方面，诸如思想解放、离奇荒诞、反讽等，堪与欧美的“黑色幽默”相媲美。他认为，中国幽默的一大典型特点是含蓄和明快的辩证统一，而又以明快为主。

陈孝英还邀请我参加了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举行的国际电影艺术研讨会，虽然会议由于资金不足未能开成国际性的，但还是超出了国界。有来自中国香港的代表，甚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活动史上首次从中国台湾来的代表参加。我本人尽管不是国家的正式代表，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见习人员，但还是代表了苏联。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还特别为我们4位外宾代表举行了荣幸的宴会。宴会上，我们享用着这座海滨城市肥美的蟹肉，谈论着中国台湾与大陆、中国香港与内地这几条支流文化平行发展的重要意义。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然而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又具有文化诸多方面不同的特点。

作为一种成果，我们在广州成功地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喜剧美学研讨会。前两届是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在陕西省召开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陕西省早已成为清扫“奥吉亚斯牛圈”的先锋——“奥吉亚斯牛圈”是陈孝英对中国喜剧美学问题的称呼。陈孝英是大会组委会两位主

席之一，并负责这次研讨会主席团的工作。我带去了影片《海神节》（这要感谢我国驻北京的大使馆，而大使馆也感到苏联的好片子不多）。尽管会议放映了美国、法国、南斯拉夫、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影片，苏联的这部《海神节》仍然十分引人注目。喜剧电影就是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周身溢满潮气的广州，五月初就用35摄氏度的高温来欢迎我们。这里当然不是进行学术讨论的最好环境，尽管华南师大会议厅的空调设备减弱了闷热的程度，但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日程安排：上午8:30—12:30开会，下午3:30—6:30仍是开会，晚饭后到11:30观摩电影，其实，看电影并不是休息，这可是后面讨论的资料呀。不言而喻，日程表也并非一成不变，时有错前错后或短暂的间歇。但总的来说，每个大脑都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

人们就喜剧电影、娱乐性的水平、思想观点和表现形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包括张刚的讽刺喜剧，它吸取了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相声艺术中的许多精华，大胆而犀利地讽刺，蓄意追求粗犷。还有李兴的喜剧片《死去活来》更富于分寸感，此外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僵尸片等。

一天晚上，参加研讨会的导演张刚邀请我们看他新近拍成的影片，一伙黑头发的大学生群情

激昂。当这位导演走到话筒跟前讲话时，观众们大声欢呼起来。他描述了自己的系列片中的人物阿满。这是一个只顾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个人幸福，从不费神关心别人的年轻人。在不同的影片中他虽然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万变不离其内心庸俗的本质。导演自问道：“谁是阿满？我在寻找，至今仍在寻找。”阿满是作者揭露的一种社会现象。

短短的南方之夜容不得半分钟偷闲，于是在观众的哈哈大笑中，那位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自私自利之徒开始了种种奇遇。说句不违心的话，我不喜欢编剧随意迎合观众的意图，因为他没有去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而是落到了低级趣味的地步。但是应该看到，年轻的观众都看得很开心。这很合他们的心意，而这种现象需要认真分析思考，研讨会最后一次会议就此话题进行了讨论。

西安喜剧美学的勇士们已经开始了一次艰巨的探索。

让我们祝愿他们的事业顺利成功！

（原文载俄罗斯《新时代》周刊1988年第51期，秦音译）

[阿·谢·托罗普采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